

杨庭硕○著

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实际 经营 原理

贵州民族出版社

序 言

冯祖贻

1992年,当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时,我便为他们选报的课题所吸引。1993年杨庭硕先生接管主持该课题,我对他精心构撰的课题设计感到满意。果然,这个名为“影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非经济制约因素分析”的课题,很快被中央有关部门确认。经过杨先生近两年辛勤的调查和研究,当1994年课题组织验收时,一本40余万字的《相际经营原理》的打印稿已放在专家面前,与会专家经过细致审定,一致给予很高评价,并建议将该项成果迅速推向社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经作者反复推敲、修改,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但是作者的喜事,也是贵州社科界的喜事!

该课题和形成的专著《相际经营原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当前,全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围绕世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大问题;同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见成效,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

这同样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就将“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它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世界不发达地区和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如何促进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的政策问题,是需下大力气来加以解决的。人们也许意识到,无论是寻找经济滞后的原因,或是探求加速这里经济发展的对策,单一的从经济角度出发,既无法找出全面、正确的根据,也寻求不到可靠而有效的对策。以中国中西部地区为例,这里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形复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形成了它富有特色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它对这里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必须拓宽思路,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一起作为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加以综合考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单一的经济投入而不计其他,必将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多年来我们在一些地区单一输血式的扶贫工作,已经给了我们过多的教训。

本书从正面回答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影响中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包括了哪些方面,它们的历史与成因,它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的评估,怎样从非经济因素中找出促进生产发展的契合点,如何避开、克服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等等。我想任何关心贵州和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导和朋

友,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本书虽以贵州作为“个案”,但由于贵州本身的特点和本书又常以中国中西部和世界相同地区作参照系,因此本书的价值已超过了特定范围,是一本对所有不发达地区有普遍意义的著作。

第二,本书有较高的理论视角,在理论上具有独创性。

作者通过了理论的不不断提升、凝炼,形成了本书独特的相际理论。作者为什么将各民族内在特质形成的系统称之为“相”?这是因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规约下的社会都有内在特征,这些特征以各种形式如风俗习惯、语言、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等等表露出来;同时,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又是经该民族加工改造过的产物,它们也打上本民族文化加工的烙印,同样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将这些由各民族社会文化所规约下的社会与自然特征结合体称之为“相”。这既符合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与自然科学(现代物理学)的定义相吻合。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充分理由的。有的专家曾认为“相标关系”不如“族际关系”通俗易懂,我认为“族际关系”远不如“相际关系”更具有理论概括力。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民族之中,由于所处自然环境不一,与周边异民族交往程度不同,社会文化也有差异,这样即使在同一民族间也会产生不同的“相”,这远非“族际关系”所能涵盖的。

作者对“相”的构成(子系统)还作了如下概括:一,每个民族特有的社会传统文化;二,该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样的自然环境是该民族凭借文化加工改造的结果;

三,该民族所属国家以及该国实行的法律政策及行政体制。这个概括既肯定了各民族的“相”在历史形成中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也充分估量了在充分了解各民族实际情况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政策,对改变或推进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这就为本课题研究找到了坚实的理论立足点。本书提出的“相际”理论,只要了解了它的真实内涵,就不难看出,它适用于一切开发异种文化的场合和地区,这就赋予了它普遍指导的功能。

本书立足点高,还在于作者借用了当今西方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理论,加以综合分析,扬弃了不适用的部分,吸取了对我国有用的部分,使“相际”理论比较丰富、充实,加强了它的理论概括力度。

第三,本书写作目的是针对现实的,在方法论上是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又返回到实践,指导人们去解决民族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

本书是在作者对贵州各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读过本书后,人们都会体验到作者是以文化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眼光去审视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凡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教育、自然环境、经济发展都在作者观察、审视之列;凡影响这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因素,作者都没有放过。作者不仅是冷静的研究者,更是民族地区开发的参与者。作者常为一项政策符合了这里的“相”,促进了这里的发展而欣喜,也为某些政策因与当地实际情况不符而感到惋惜。作者致力的是为当代经济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找到生长点,因此打开本书,扑面

而来的是一股质朴、浓烈的乡土之风，几乎每一章节都在讲述着在我们身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故事，使你不得不思考和寻找对策。

当然本书的“政策论”和“对策论”更是专谈“对策”的，但它与一般的讲政策、说对策不同，是一种在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和对策的研究，或是高层次的政策、对策。假若不信，我们试举一例。在“对策论”中，作者提出了对策思路问题：是从汉族发达地区着眼，还是从民族地区角度来反视？是相信物资、人力、技术，还是相信国家政策？是代替民族地区发展，还是调动民族地区自身力量？这里提出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输血”和“造血”问题。作者以国内外实例，有力说明了民族地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能够发展的，接着作者的整体性和非均衡性相统一、等价进出与自我优化相统一，两大问题陈述了贵州民族经济的整体发展必须走一条先允许非均衡发展的路子；同样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要自我优化，那么，在社会主义优越制度的保护下，民族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就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得到健康发展。这些分析，高屋建瓴，值得人们回味再三。

我有幸提前读了这本书书稿，总的来说，本书挑选了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丰富的素材和新型的理论框架构筑了它，又为现实的政策和对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确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还需介绍的是，本书作者杨庭硕先生是一位中年学者，他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相信，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变革的

环境中,作者的前景将是非常广阔的。这里,我想起了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讲过的一段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本书在理论框架上或许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作者在伟大时代所发挥出的创造精神、巨大的热情是值得赞许的。时代召唤着“巨人”,我们寄希望更多的理论工作者、专家们投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期望。

1996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1)
第二节 本书的目的与任务	(13)
第三节 实现目的的手段	(26)
第四节 相际经营的基本概念	(39)
第二章 开发论	(53)
第一节 开发的本义及其流变	(53)
第二节 传统开发模式及前人评述	(67)
第三节 我们面对的现实	(86)
第三章 文化论 (上)	(99)
第一节 文化的实质与结构	(99)
第二节 人类经济生活异同综述	(111)
第三节 相际产品接轨障碍	(126)
第四节 型差与式差区分的经济学意义	(141)
第四章 文化论 (中)	(159)
第一节 习俗诱发的干扰因素	(160)
第二节 信息的接收与应用	(176)
第三节 社团、产权与生产组织	(193)
第五章 文化论 (下)	(217)
第一节 科技推广中的钥匙与锁	(217)

第二节	民族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236)
第三节	无形的潜网·····	(259)
第四节	回避不了的问题·····	(271)
第六章	背景论·····	(285)
第一节	相际经营中的背景异同综述·····	(285)
第二节	自然背景的性质和制约机制·····	(294)
第三节	异质生境兼容性分析·····	(309)
第四节	空间衰减与投资扩大化·····	(328)
第七章	实力论·····	(343)
第一节	经济实力的构成要素·····	(343)
第二节	经营实力总量的框算·····	(367)
第三节	影响经营实力生效的制约因素·····	(387)
第八章	政策论·····	(409)
第一节	计划经济得失综述·····	(409)
第二节	计划经济失控在民族地区的后果·····	(426)
第三节	现有人文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446)
第九章	对策论·····	(461)
第一节	对策思路述评·····	(461)
第二节	整体性与非均衡性之统一·····	(479)
第三节	等价进出与自我优化之统一·····	(494)
第十章	余论·····	(507)
第一节	调查对象简介·····	(507)
第二节	苗族的认知模式·····	(518)
第三节	从古代到近代·····	(530)
第四节	从近代到现代·····	(544)
第五节	杉坪生活方式·····	(557)
结束语	·····	(563)
后 记	·····	(567)

第一章 绪论

本章提要： 开发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由来已久，在古代主要由中央政府主持，以后才逐步加入了民间开发的成份。不管由谁去主持开发，都得面对同一个问题，即必须凭借汉文化去对异文化区域从事开发活动，必须在很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下进行开发。从事类似的经济活动，不仅纯经济的手段难于施展，而且效益也比汉族中心地区同样的经济活动要低得多。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一些既涉及到自然环境差异，又涉及到文化差异的特殊理论课题。这样的课题既无法用单纯的经济手段去加以解决，也无法用单纯的文化人类学手段去加以解决，它应该用文化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经济人类学去解决。

第一节 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很不相同，在不同的地区从事经济开发，必须因地制宜，才能收到实效。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互不相同，相应文化规约下的经济生活也各不相同。不管从哪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出发，对异民族地区实施经济开发，都会遇到投资扩大、效益下降、稳定性差等困难。造成类似困难的原因不仅取决于经济方面，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不容

忽视。也就是说，决定在异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成败的因素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问题。要使少数民族地区迅速赶上全国的先进水平，要使我们的开发工作更有成效，我们就必须探寻出合理的具有操作性的对策来。这乃是本书探讨的中心课题。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贵州省的自然条件与中原也大不一样，因而贵州的开发成效不够理想，它至今还是全国最穷困的省份之一。开发的反复也较大，历史上曾多次大规模地组织过对贵州的开发，又多次放弃过对贵州的开发。贵州开发的这一特点显然不是例外，类似的情况在广西、云南、宁夏、甘肃、陕西的北部、内蒙古的南部也可以观察到。可见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中的非经济制约因素，不仅是贵州的问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课题。不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中非经济制约因素的认识，我们就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辙，像贵州这样的地区，不仅难于实现现代化，还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拖累。推而广之，这还是全球性的课题。“二战”以来，尽管发展中民族纷纷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尽管他们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们与发达民族之间的差距却在扩大。尽管他们不惜高价，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他们也曾千方百计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对本国从事经济开发，然而这一切都无法使他们真正地富强起来。这些令人困惑的事实，单从经济、政治、自然条件、历史传统，或所谓的“国民性”去分析，都得出不了满意的解释来。无数的事实迫使我们逐步清醒过来，只有对非经济制约因素作系统的研究，才能为发展中民族找到出路，使他们勃发生机。那么什么是非经济制约因素呢？

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一场综合性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良性运行必须依靠社会背景的支撑；人类的经济活动又是一项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活动。客观的自然条件对经

济活动的成败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在一个既定的自然环境中，在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社会内从事经济活动，我们可以忽略社会与自然的制约因素，可以就经济的各构成部分直接讨论经济活动的成败。这项科研任务传统上是由经济学肩负。但是，假如在不同文化规约下的社会中，具体来说，就是在不同的民族间，在迥然不同的自然背景下，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单纯的经济理论就远远不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研究经济问题，还得认识非经济制约因素系统，从中找出合理的对策来。我们说，非经济的制约因素是一个系统，是因为足以制约跨民族跨地区经济活动成败的要素很多，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共同结成一个有系的网络，对跨民族的经济开发施加影响。

要认识这样的制约因素网络，首先得弄清它的构成，次之得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还需要认识它们与经济活动关系的远近。足以制约跨民族经济活动成败的自然和社会要素十分复杂，大致说来，如下一些内容值得注意。就自然环境而言，两个民族之间空间距离的远近，资源构成上的差异，各民族对自然资源已经利用的深度，及其在该利用层次上形成的客观现实等，都会导致跨民族经济活动的成败。就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言，自身已有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状况，甚至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有关民族所在国家的政策、法律、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对跨民族经济活动的成败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些非经济因素之间又相互制约。比如，当代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已经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环境，各个民族所处的环境已经由该民族及相关的民族作过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自然环境，事实上已经打上有关民族加工的烙印。跨民族的经济活动从来不是在纯客观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而是在相关民族加工改造后的自然环境中展开。与此同时，相关民族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的价

值取向，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等等，也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制约因素，它们之间也处于交互制约之中。比如，不少民族的学校教育，既可以是教会或社会集团办学，也可以是私人或国家办学。又比如，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既可能是传统的延续，又可能是宗教和伦理道德模塑的结果，也可能是生存背景模塑的产物，同时还体现出该民族科学技艺的发展水平。总之，这些社会性的非经济制约因素，不是单个地对跨民族经济活动产生制约作用，而是结成一个有系的潜在网络，对跨民族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从研究跨民族的经济活动需要着眼，我们可以把这些非经济因素作如下粗略的划分。自然环境主要制约跨民族经济活动投资额的扩大，而两个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主要制约了经济活动的效益；两个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主要造成开发活动经营的复杂化，同时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益；而有关民族的法律和政策则直接影响了跨民族经济活动时间延续的久暂。

相关民族的文化差异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至第五章“文化论”（上、中、下）中加以讨论。关于自然环境和两个相关民族间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我们将在第六章“背景论”中加以讨论。至于国家政策法律对相关民族间经济活动的影响，我们将在第七章“实力论”与第八章“政策论”中加以讨论。跨民族经济活动中非经济制约因素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种：一、近现代的经济活动，往往是由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集团所主持，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尽快地获取经济利润。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只能从短期的、范围有限的目标着眼，即使由于非经济因素制约而造成了经营的失败，他们只会追究经济或操作技术上的原因，很少注意长远而普遍的非经济制约因素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被扩大到它所不适用的背景上去加以推广。二、在古代，跨民族的经济活动往往由国家主

持。这种经济活动希望达到的目标，主要不在于经济本身的实惠，而是取决于政治、军事，甚至是统治者个人心理的需要。这样的经营活动一旦失败，往往仅追究政治、军事的责任，或者指责统治者个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而把经营活动的失败搁置在一边，这是史学研究的常见倾向。在这样的倾向下，非经济制约因素的存在，自然被人们普遍地忽视了。三、对异民族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是由文化人类学家去承担。由于早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主攻方向在于认识异民族的文化特征，较少考虑异民族之间的经济接轨，因而一直到本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很少把经济研究与民族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直到波拉尼（Karl·Polanyi）开创了经济人类学之后，这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亟待深入，更有待于普及。这正是时至今日，不少人在规划异民族间的经济活动时，很少注意到非经济制约因素存在的客观原因。

我们认为，非经济制约因素的客观存在不容忽视，必须引起学术界和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否则对异民族的经济活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还可能会诱发其他方面的隐患。尽管我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然而前人多次开发过的西北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是我国经济落后的地区。与此同时，这些地区不仅经济发展不起来，而且生态环境还在不断恶化。这样的生态恶化甚至还威胁到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事实证明，要使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赶上全国的先进水平，仅从政治角度考虑是不行的，仅从经济角度去考虑也是不行的。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地区非经济制约因素的研究，并把这样的研究成果尽快地付诸应用，才能扭转对这些地区开发的盲目性，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

解放 40 多年来，人民政府使各族人民在法律上取得了平等待遇，在经济上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也花过

大力气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巨额的经济资助，还大规模地从内地调进了各种人才，希望能使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尽快地发展起来。可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比较起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解放前，经济落后的西南和西北各民族地区，至今仍是全国的贫穷地区。政治经济条件如此优厚，这些地区同样发展不起来，把原因都归结于政治或经济，显然是说不通的，还应归结于我们对非经济制约因素的研究很不充分。

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非经济制约因素的存在同样不能忽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世界格局的结束，世界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个主权国家都在力图发展自己的经济，寻找国外市场，获取国外的资源和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跨民族的经济活动极其普遍。然而，这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样不是纯经济的关系问题，也不可能完全由政治手段来加以解决。当今世界上，经济南北对峙的局面长期无法缓解，多边贸易协议的难产，第三世界国家债台高筑，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滑坡，这一切都与非经济制约因素的存在息息相关。不深入研究非经济制约因素，人类就无法求得各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也无法缓解因经济发展不均衡而造成的摩擦和战乱。回顾一下“一战”和“二战”时期的世界局势，对于这种隐患的危害性，我们将得到较清晰的认识。“一战”和“二战”前夕都是因为有关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结成经济同盟，进而发展成为军事同盟，最后酿成各军事同盟之间的世界性战争。“二战”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可是他们的经济长期滞后，长期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为了自保，他们也在不断地结成经济或军事同盟。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之间也在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结成各式各样的经济或军事同盟。这一切构成了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发展不是带来世界的稳定，而是种下了更大规模

冲突的隐患。消除隐患,同样不能单纯靠经济或政治的手段,而必须对非经济制约因素进行研究。由此看来,本书取材虽然仅立足于贵州省,但形成的结论具有极大的可推广性。不仅可以在国内的类似地区推广,而且可以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新的思维框架,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更具有长远的主动性和洞察力。

两千多年过去了,贵州的经济开发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实质性变化,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又事关大局的问题。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却极为困难,这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时代,其构成要素很不一样,经济活动的侧重点也完全不同,以至于经济数据统计口径也根本无法重合。因而孤立纵向地比较一个地区的经济统计数据变化而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一个直线上升的正数。这样的结论,由于失去了参照数据,因而无法正确地反映经济活动的实际差异,当然也不能揭示经济变化的实质。为了揭示贵州经济开发古今差异的实质,我们必须找到能贯穿古今的度量指标,而且必须确认这些指标的度量结果能在不同时代反映事物的实质。这样的指标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罢了。我们认为下述三个指标就具有这样的性质。

首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在全国总体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其次,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建制在财政自给上的水平。其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运行对中原汉族地区的依赖程度。

不同时代的经济活动,其产品结构、投入方式、劳动力的组合都很不相同。不同时代同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很难找到哪一种产品贯穿古今,也很难找到生产投入的统一计价标准,至于劳动力的组合方式更是古今不可同日而语。要度量古今经济的差异,事实上无法找到同值的测量对象。不管根据什么样的单项测量结果去评述贵州经济的变化,显然都无法反映实质。但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在全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由于不是以具

体的单项指标为测量基础，而是不同时代综合经济实力的比较结果，因而这样的比值可以客观代表贵州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考察这种比值的变化就能客观地反映贵州经济活动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升降。

从西汉中期开始，中央政府陆续在贵州地区设置了大大小小的行政机构，以治理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行政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不同的名称。从两汉至南北朝，统称为边郡。边郡一般不征收税赋，也不干预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对这种状况的实质说明，可以参见诸葛亮的南中决策^①。在这种情况下，贵州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对全国不发生实质上的影响。无怪乎在当时汉民族眼中，把这里视为不毛之地，无用之民。

隋唐至两宋的中央政府均在贵州地区设置羁縻州县。所谓羁縻州县，按当时人们观点看来，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些羁縻州县的少数民族头人愿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愿意臣服朝贡，中央政府从不拒绝他们，一概欢迎接纳，从优赏赐，封以官爵。一旦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不来朝贡，甚至与其它政权发生关系，也不追究其责任。前提仅是不危及中央政权的安危。这样的羁縻州县其经济活动在全国的比重是不言而喻的。据宋史记载，当时统治黔中地区的布依族“五姓蕃”^②极其贫弱，向宋朝表示臣服，连年朝贡。目的在于用有限的土特产去换取中央政府的优额赏赐。由此看来，贵州这些地区当时的经济活动对于中央政权而言，不仅起不到实质性的经济作用，反而需要中央政权耗费资财去加以笼络和安抚，以避免他们与中央政权为敌，扰乱边境，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军费开支。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在全国经济总

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P. 920 至 P. 921，（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 1975 年 4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② 《二十五史》本第八册《宋史（下）·蛮夷传》P. 6785，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年 12 月第 1 版，1990 年 7 月第 7 次印刷。